

人物特写

人生掠影

漫画家鲁少飞

林阳



鲁少飞

鲁少飞被后人誉为中国现代漫画的“鼻祖”、中国漫坛的“伯乐”。曾创办中国漫画家协会。鲁少飞的父亲鲁承荣是一位民间画工。鲁少飞自幼受家庭熏陶，随父习画。他曾因为临摹广告上的一只锃亮的皮鞋而受到大家的表扬，增强了画画的兴趣和信心。

1936年夏天，鲁少飞与叶浅予、张光宇、张正宇等发起组织“全国漫画家协会”，并筹备举办了“中国漫画史上第一次”“全国漫画展览”。鲁少飞从此成为中国漫画界的旗帜人物。

1937年，“八一三抗战”爆发后，鲁少飞与张光宇、王敦庆主编《救亡漫画》三日刊，第二期刊登了自己创作的《日寇将活人当靶子》，揭露了日本侵略军的暴行。《救亡漫画》出版了十期，直到上海沦陷才停刊。

1938年，鲁少飞去广州，主编《国家总动员画报》，向民兵宣传坚持抗战。此时，鲁少飞是中国全国漫画家协会战时工作委员会委员。不久，他又去了香港，在那里遇见了曾在上海《立报》共过事的萨空了。

1938年，鲁少飞在萨空了的介绍下去新疆。他们全家跋涉了八个月才抵达。鲁少飞在新疆担任《新疆日报》漫画编辑，他每天给《新疆日报》画报头漫画。

1946年，他与常书鸿、赵望云、潘絮兹等人在甘肃省立图书馆艺术生活旬刊社主办了第一届美术展览会。一时观众如云，身处西北内陆的兰州广大市民大开眼界，欣赏到了漫画、油画、素描等诸多画种。

这期间，鲁少飞还在兰州和重庆举办了“鲁少飞新疆画展”。

鲁少飞在《记在兰州的漫画二三事》中说：“我总觉得当时在兰州，对漫画一门竟没有人来认识它的功用，所以亦没有支持

者，遂亦没有发表的园地，意思是完全缺乏立足之地。时代变了，今非昔比，是可以如鱼得水，力求发展。”

1989年，甘肃漫画研究会副会长苏朗在《甘肃晨报》上发表文章，他说：“追溯历史，甘肃的漫画早期发端可以从抗战时期说起……鲁少飞创作了连载漫画《马二哥》等作品，还举办过漫画作品展，这是甘肃漫画的发端时期……鲁少飞在兰州的漫画创作，无疑是为甘肃漫画事业拓荒，让民众认识了漫画，逐渐了解漫画的作用。”

在鲁少飞的创作和带动下，甘肃漫画创作从此逐渐发展起来。

新中国成立后，鲁少飞到人民美术出版社参加工作。《苏加诺工学士、博士藏画集》是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重点图书。苏加诺是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首任总统。该画集由安靖、鲁少飞担任责任编辑。在1959年莱比锡国际图书艺术博览会上，该书获得了金奖，这是新中国在世界上得到的第一个图书金奖。

苏加诺总统亲自写序，他说：“这并非是因为我的藏画水平很高，而只是说明了我对艺术的爱好，同时也为了使中国人民和印度尼西亚人民之间的兄弟般的友谊更加密切。”

1958年，由鲁少飞编辑、李文昭设计的《西行漫画》出版，这其中有个传奇故事。

1958年，一位读者偶然在北京图书馆发现了一部出版于1938年的《西行漫画》，内容是炭笔素描的“夜行军中的老英雄”“过湘江”“遵义大捷”等二十五幅反映长征的绘画作品。1938年，时任红军第一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第二师政委的萧华将这些画的照片交给当年在上海主持风雨书局的作家钱杏（阿英）编辑出版，当时印制了两千册，大部分发在国统区，不久便被当局查处没收了。人民美术出版社得知此书信息后，决定出版，由时任美术编辑组组长的鲁少飞担任责编，李文昭负责美术设计。

萧华为《西行漫画》作序，他在序中说：“这本《西行漫画》是20年前在上海出版的，漫画作者已经查不清是什么人了，我想，很可能是红军第五军团中做宣传工作的同志们。当翻阅这本小小的画集的时候，我难以抑制内心的激动，短短的25幅漫画一下子就会把我拉回到20多年前的回忆中。一些永生难忘的情景展现在我的面前：终年积雪的夹金山，茫茫无垠的大草地，波涛滚滚的大渡河，深山老林中的篝火，西北高原上的风沙。”

1958年版《西行漫画》没有署名，发行三千册，后来方得知，绘画作者是黄镇（时任外交部副部长）。

这本书，人民美术出版社从1962年至1986年，再版了四次。黄镇将其定名为《长征画集》。

阿英写道：“这20多幅画，是伟大长征的片断纪录，是真实的革命史料，也是珍贵的艺术品。作者同千千万万的战士一道，万里跋涉，在战斗的行列中，用画笔写下了这些历史的动人的场面。这些画是感人至深的。作者特别突出地反映了红军战士们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也纪录下了红军路过的少数民族地区的风光和‘干人儿’（即穷人）的苦难的生活，这样的作品至今还不多见。”《长征画集》即将再次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

常书鸿画集《常书鸿》1959年出版，十五开，活页共13张。鲁少飞为此书作序。在序中，鲁少飞以专业的眼光评价常书鸿的绘画，他说：“画家所画的静物油画，以周密、细致、精确、完整的各项处理见长，能给予人一种色彩复杂丰富和整体协调而耐人寻味的感受。‘鸡’主调是银灰色，气氛柔和，明暗变化很匀称，笔触也很痛快豪放，是画家得意的作品。‘平地一声雷’红的暖色调和绿的冷色调相互映照和呼应，各种物色色调画得很细腻精确。”鲁少飞在此书“序”中，深入肯綮，分析了常书鸿绘画的特点，十分到位。

1955年，为普及美术，鲁少飞编辑了一本叶浅予著的《怎样画速写》。1958年，

他策划了“初级技法丛书”十六种。这些普及版小册子为新中国的美术普及工作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1958年，鲁少飞编辑了一本《门采尔素描选集》，精装本。这本书装帧气派，不知在“文革”中，是否因为“洋”而被批判。2006年，这本书被年轻编辑从图书馆找出来，重新出版，至今已再版5次。

1964年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现代人物画选》也是鲁少飞编选的，这本书有黄青、刘继卣、蒋兆和、关山月、刘文西等几十位画家的作品。

人民美术出版社社长田郁文曾说：“我有机会看过档案，少飞同志经手的稿件件件认真仔细，无懈可击，实该青年编辑好好向他学习。”

我在人民美术出版社图书馆寻找鲁少飞的印迹，找到了他编辑的21本图书，因为单位搬家，许多图书未能找到，比如他编辑的“初级技法丛书”十六种，我只看到了三种，说明鲁少飞在人民美术出版社十几年来，编辑过大量图书。

鲁少飞是中国漫画史上元老级的漫画家，又是编辑大家。

正如影像在中国的发展与世界同步一样，民国漫画也跟随世界的脚步。它们都是代表一个时代的艺术种类。在漫画最活跃、最繁荣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有20多本漫画期刊先后问世……

（作者系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民进中央开明画院院长）



1984年，《时代漫画》50周年纪念活动，鲁少飞（左五）与叶浅予等老艺术家们在胡朝宗家合影留念。

大家小说

左宗棠与湖南人的精气神

——纪念左宗棠诞辰210周年

政协湖南省委员会研究室

左宗棠，是我国近代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是中国近代洋务运动代表人物，也是中国现代化的先驱者，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湖湘文化的践行者。

左宗棠身上彰显着湖南人“敢为人先”的果敢气度。他开风气之先，积极主张“师夷长技以自强”，坚持自立、自主的原则，大力兴办洋务，发展近代工业并培养科技人才。1866年，左宗棠在福建创建福州船政局，他一面从外国订购造船机器、轮机和船槽等，一面聘请西方工程技术人员，在引进吸收的同时抓住主动权，打破列强技术垄断，建立了我国近代史上第一家真正意义上的新式造船厂，成为“中国制造肇端之地”。同时，他创设船政学堂（亦称求是堂艺局），制定《求是堂艺局章程》，“延致熟习中外语言、文字洋师，教习英、法两国语言、文字、算法、画法，文字名为求是堂艺局，挑选本地资性聪颖、粗通文字子弟入局肄习”，为中国海军及航海事业培育大量人才，被孙中山先生赞誉“船政为海军根基”。后来在北洋两次海战中叱咤风云并以身殉国的英雄林永升、邓世昌、刘步蟾，清末民初的海军将领萨镇冰、程璧光等人均出自船政学堂。来到陕甘后，左宗棠又引进西方的先进设备、生产技术和手段，创办了西安机器局、兰州制造局、兰州机器织呢局等近代军事和民用工业。近人秦翰才先生在《左文襄公在西北》一书中就称“西北近代文明之肇始，实起自左文襄”。在长期以来闭关锁国、盲目排外、以洋务为耻的社会环境下，左宗棠学西方图强的开放胸怀、兴洋务救国的远见卓识、领风气之先的改革创新举措便愈显难得，这也是对湖南人“敢为人先”的果敢气度的最好注脚。

左宗棠身上闪耀着湖南人“经世致用”的务实风格。他早年深受贺长龄兄弟、陶澍、魏源等湖湘经世学派士人的思想影响，讲求“实学”，好读“有用”之书，用心钻研地、兵书、农桑、水利、盐政、漕务等有用之学，亲手编绘全国及各省地理图本和历史图册，以自己独特的见解对时局进行分析判断，这也为他往后外抗侵略、内事建设做

了学识上的充足准备。左宗棠极为推崇主张经世致用的魏源，不仅为魏源所撰《海国图志》再版作序，还在写给女婿陶沅的信中盛赞该书：“近料理新疆诸务，益叹魏子所见之伟为不可及，《海国图志》一书允足称也”。他在自著《学艺说帖》中剖析世界大势，主张改变以往重义理而轻技艺之弊，倡导认真学习西方技艺而谋求富强。左宗棠极为注重“实政”，《清史稿》载“宗棠事功著矣。其志行忠贞，亦有过人。廉不言贫，勤不言劳。待将士以诚信相感。善于治民，每克一地，招徕抚绥，众至如归。论者谓宗棠有霸才，而治民则以王道行之。信哉！”左宗棠驻扎西北十三年半，经营西北，夙夜在公，任上施行的善政懿行不胜枚举，涉及到军事、财政、民政、经济、教育等方面方面，左宗棠终生崇尚“通经致用”，追求“修齐治平”的“实行”“实效”，鲜明标识了湖湘文化“经世致用”的务实风格。

左宗棠身上凸显着湖南人“坚韧不拔”的坚毅品质。在他身上有一股湖南人所谓的“耐得烦，霸得蛮”的血性。左宗棠从不“一介布衣”成长为“中兴之臣”，前40年不求闻达，厚积薄发，守得住清贫，耐得住寂寞，为之后运筹帷幄，决胜千里而积蓄能量；出任督抚幕府长达8年，48岁才开始创建楚军，独当一面；50岁才开始主政一方，大器晚成。为捍卫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左宗棠孜孜不倦，不达不休，连续向朝廷进忠言、献良策，终于争得朝廷对“塞防与海防并重”的认可；还先后六次上奏，请求在新疆和台湾设省、置郡县以实施有效管辖；在西北任上，面对嘲讽和困难，他都概不介意且越挫越勇，“天下事总要人干，国家不可无陕甘，陕甘不可无总督，一介书生，数年任兼圻，岂可避难就易哉”。

作为湖南后人，我们纪念左宗棠诞辰210周年，就是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刻领会湖湘文化精神，涵养向新而行的中华文化自信，凝聚起三湘儿女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湖南的磅礴力量，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湖南篇章而团结奋斗！

学海星光

为电影编剧事业凝聚力量

——记第一届中国电影编剧周系列活动

本报记者 杨雪

剧本，剧本，一剧之本。剧本作为电影作品人物塑造和情节结构的基石，堪称一部影片的灵魂，也是观众对一部电影最关注的部分和优质与否的重要评判标准之一。近日，闫少非、刘恒、阿来、王兴东、张光北、陈国星、皇甫宣川、苏童、汪海林、赵卫防、张丕民、童刚、黄建新、卢奇等知名业界人士齐聚福建泉州，参加由中国影协、福建省电影局、泉州市人民政府主办，中国文联电影艺术中心、中国影协电影文学创作委员会、福建省影协、中共泉州市委宣传部、泉州广播电视台、鲤城区人民政府、泉州文化旅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承办的第一届中国电影编剧周系列活动，共同助力优秀电影剧本创作推介、推动中国电影高质量发展。

第一届中国电影编剧周以“致敬编剧”为主题，涵盖第一届“中国影协杯”荣誉影展、中国电影编剧论坛、电影文学论坛、电影编剧之夜、电影文学之夜、“宋元中国·海丝泉州”采风、电影大师课、第13届“中国影协杯”年度十佳电影剧作推介之夜等系列系列活动。活动旨在打通电影制作产业链，进一步推动电影与文学的联动发展，为编剧和作家提供良好的互动平台，加深文学与电影的联结，为中国电影事业的发展贡献力量。

在3月26日晚举办的第一届中国电影编剧周闭幕会暨第13届“中国影协杯”年度十佳电影剧作推介之夜上，《邓小平小道》（编剧王兴东）、《悬崖之上》（编剧全勇先、张艺谋）、《长津湖》（编剧兰晓龙、黄欣）、《守岛人》（编剧陈力、丁涵、赵哲恩）等作品获得年度十佳电影剧作荣誉。

中国电影分党组副书记、秘书长闫少非在第一届中国电影编剧周开幕式上的致辞中表示，伴随着新时代伟大征程的强劲步伐，中国电影发展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机遇期，前景光明、未来可期。从源头抓起，从根本上推动电影创作繁荣发展，是新时代新征程赋予电影

工作者的一项光荣任务。他表示，中国电影编剧周将推动文学创作与影视化改编良性发展，努力为电影文学创作和编剧交流搭建平台，为优秀电影剧本创作和产业发展提供帮助和支持。与会的编剧同仁和电影界朋友，将在这个崭新的平台上，畅谈创作心得、广泛凝聚共识，为中国电影编剧事业加油助力。

在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铸就电影文学新辉煌”为主题的中国电影编剧论坛上，中国文联副主席，著名编剧、作家刘恒认为，编剧是劳动在生活第一线的文化工作者，也是电影创作集体中不可或缺的一员。作为个体的生命，编剧要处理好自己与环境的关系、与他人的关系、与自己的关系。一位编剧要面对自己对世界感受越来越迟滞、固有成见越来越深等一系列问题，只有不断摆脱困境、战胜自己，才能创作出更优秀的作品。

北京影协主席、著名导演、编剧、监制黄建新表示，中国电影与文学的关系向来极为密切，导演常常会站在作家和编剧的肩膀上创作影片，电影编剧与导演的关系，就如同作曲家与指挥家的关系。他认为，电影文学剧本不仅是影片拍摄的基石，也具有文学审美的价值，是电影创作过程中极重要的环节。在中国影协电影数字技术工作委员会会长、著名导演、编剧江海岩看来，电影是以时间为轴线的空间艺术，通过影像展现创作者对生活的理解和感受，文学剧本就像一部电影的“基因”，是一切影像元素诞生和发展的基础，可谓重中之重。

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学会秘书长、著名演员张光北回忆了参演电影处女作《芙蓉镇》时的往事：当时所有演员在熟读小说原著《芙蓉镇》后，集体前往影片拍摄地永顺县王村镇体验生活三个月，在此期间他们根据对各自饰演人物的理解，创作了大量即兴戏剧小品片段，并汇总到谢晋导演那里。最后在作家阿城与谢晋导演创作的文学剧本中，就融入了很多即兴戏剧小品的元素。他坦言，电影剧作与电影表演，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关系。

吴洪亮：用好文化引擎，带动城乡发展

本报记者 杨雪

近年来，各地兴建博物馆、美术馆，举办双年展、大地艺术节等艺术活动，可谓此起彼伏，热闹非凡。美术馆前长长的人流，乡村里树立起艺术新地标，的确令人兴奋。然而，很多耗巨资投入的文化项目试图建构品牌影响力，吸引游客，继而拉动经济，但由于没有核心竞争力，热闹一阵后很快就沉寂了。于是，我们看到了不少荒芜的文化广场，空旷的博物馆，以及仅有“首届”的双年展、只做过开馆展的美术馆，抑或在延续但面临概念老化、日趋疲软的项目。在北京画院院长吴洪亮看来，要让文化引擎真正发挥作用，不仅需要创新的勇气与热情，更重要的是深入的调研、有效的规划、长期的战略、合理的评价机制以及有良好黏合度的观众群体。

他认为，文化项目不仅仅是文化的事情，它也会具有社会的属性、经济的属性甚至政治的属性，其本身就是个综合体。越是在地性的项目，越是

乡村的项目，越需要开阔的视野，越不能拍脑袋、“大水漫灌”似的一哄而上。前期的调研与规划需借助多方力量，多学科专家的共同参与，形成合力才会产生真正的效能。文化品牌的建立不可能一蹴而就。文化品牌的形成是需要长时间孵化的。因此，不仅需要独特眼光、强悍的能力，更重要的是长期坚持。文化项目应建立符合其发展规律的评价机制。譬如双年展，既不能成为政府单向投入的放礼花式的狂欢，也不能成为经济诉求的工具。评价一个文化项目机制的科学性是保护目，多层面的艺术博物馆、美术馆和双年展。我们过往的美术教育体系或许已然无法匹配今天的展览及艺术活动。故而，多层次的文艺普及，尤其是艺术发生学等知识的普及才是艺术可资发展的真正命脉。

杨志军：书写雪域高原的时代巨变

本报记者 谢颖

从《环湖崩溃》《大悲原》到《大祈祷》《高原大劫史》，再到惊艳文坛的《藏獒》系列，著名作家杨志军的创作有着醒目的地标性意义。他的目光未曾离开大地上的万物生灵和时代变革之下普通牧民的变迁。近日，杨志军新作《雪山大地》由作家出版社出版。这部作品同时入选中国作协“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和“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

雪山始终以母性的伟大力量滋养着大地上的生灵。在这部长篇小说中，杨志军深情回望草原朋友，将在这个崭新的平台上，畅谈创作心得、广泛凝聚共识，为中国电影编剧事业加油助力。

《雪山大地》既有强烈的面对草原问题的意识，更有在真实反映草原人民解决问题、建设新草原的文字里难掩的激情和乐观，诗性的语言形成独具个性的叙事风格，作品既真实呈现草原生活的严酷，又具盎然的诗意。杨志军出生在青海，又在青海生活了差不多40年，对于他来说，“感恩”是一个主题词。“这是一部‘感恩之作’。我感恩雪山，感恩生活，感恩草原牧民，我的回报就是不断地写出有关青藏高原的作品。”杨志军说。

终，将青藏高原几十年来在党和政府领导下发生的改天换地，当地藏汉民众生产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沧桑变化，以及以“父亲母亲”为代表的三代建设者在这片土地上耕耘建设鞠躬尽瘁的日夜展现在读者面前。

干春松：探索中国儒学的近代转型

本报记者 张丽

日前，北京大学教授、中华孔子学会常务副会长干春松精思之作《儒学的近代转型》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以政治与学术双向视角，通过“民族国家与天下秩序：西学东渐与中国文明观的调适”“制度与心性：儒家的合内外之道”“儒学第三期发展预设下的儒学重构”“儒学的学科化与摆脱困境的可能性”等章节，集中梳理、论述西学东渐下，作为中国传统中国价值主体的儒学的困境和转型，探究新时代儒学的发展和未来。

在书中，干春松对近代以来儒学发展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康有为、章太炎、钱穆、张申府、冯友兰等）及其思想主张进行分析；从制度和心性讨论儒学的整体形态发展，从经学与哲学的关系讨论儒学学科化的困境与出路，从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融合探索儒学对世

道人心和社会秩序的意义和作用，从儒学学科化制度上思考摆脱儒学困境的可能……涵盖儒学近代转型的重要领域。

自周礼到汉唐、宋元明清，儒学像一条奔腾的大河，不断吸纳、创造，既建构国人的价值观，也塑造其生活态度和社会秩序。到中西相遇，儒学发生了大转折，儒学遭受重大挑战，但也面临新的机遇。新的生机在这转折中孕育，文明的力量在冲突和融合中升级。干春松表示，像中国这样一个具有独特的文化传统和复杂的历史背景的文明体，如何调动自身的文化传统来建立现代国家，既是抵御外敌的精神要求，也是建立一个新国家所需的凝聚力的源头……传统的中国就是建立在跨文化和多民族的区域之上的，儒家观念为之提供了凝聚和维护一个共同体的文化资源，此文明亦以礼乐文明名之。

方铭：屈原研究新解

本报记者 郭海瑾

千百年来，屈原的作品及精神一直滋养着后世文人。他光芒耀千古的天才之作《离骚》，却很少有当代读者全篇诵读下来。同样，除端午节外，很少有人能清晰完整地勾勒屈原的一生。熟悉与模糊之间似乎为屈原增添了其他中国古代作家所没有的光彩。“楚辞”又与屈原联系在一起，作为一种诗歌样式，“楚辞”奇文郁起，启发着历代文学作品。日前，从“熟悉”入手，考辨屈原生平、分析其作品艺术中的《屈原与楚辞研究》出版，该书是北京语言大学教授方铭新著。

方铭介绍，本书即是在尝试解决阅读的“模糊”之处，并最终回归“熟悉”，以探究屈原文化价值的现代意义。

方铭在本书中于楚国世系中考辨屈原生平，结合史料认为屈原被“流放”并非刑罪意义的“流放”，从身世论、作品论、思想论三个方面分析了屈原的精神文化价值。同时，他还依次分析了《离骚》《九歌》《九章》《天问》《远游》《卜居》《渔父》的内容及艺术特色，探讨了屈原精神的现代意义；不仅还原历史中的屈原，还关注后世对屈原的诠释，揭示屈原作为一种“文化符号”的精神价值。